中文版序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2020年1月6日，新年的第一個工作日，我來到位於北卡羅來納州的美國國家人文中心的辦公室，開始在中心第二個學期的駐所研究。十幾分鐘後，我收到新年的第一封郵件——匹茲堡大學出版社組稿編輯Abby Collier女士通知我，我關於霍亂研究的書稿已經通過外審，評審意見非常正面。她說，相信修改工作可以很快完成，出版社也將開始準備出版合同。

回想起兩年來聯繫各大出版社、焦急等待回應的經歷，這一次外審的順利簡直讓人難以置信。看到這封郵件，我興奮地走出辦公室，跑到中心外面的樹林裏走了好幾圈，才逐漸平復激動的心情，憧憬著未來應該會是美好的。幾天之後，網上開始出現有關國內疫情的消息。當時，儘管我密切關注，但並不認為事態會超出我所理解的流行病史範圍。然而，疫情以史無前例的速度擴散，我很快意識到我已經遇上了世紀級的全球大流行病。

隨著疫情形勢的進一步惡化，2020年3月13日，美國國家人文中心宣佈暫時關閉辦公場所，為期一個月，所有駐所學者需改為居家辦公。不久之後，中心又通知，提前結束整個學年的訪學安排。學者們可以選擇返回美國各州或各自國家，亦可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繼續停留至原定的駐所限期6月。

鑒於疫情的兇險和不確定性，我選擇與家人一同留至6月份，再按原定計劃離開美國。隨後三個月中，我們蝸居在住處，我修改書稿、寫論文，小孩上網課，生活被壓縮到極為有限的空間之內。每到傍晚時分，我們一家會沿著街道步行至最近的公園。路旁停放的車輛一動不動，車窗玻璃上覆蓋著厚厚的花粉，看得出已經長時間無人使用。每到周末，我們外出一次採購生活必需品，也在超市買過接近兩美元一捲的衛生紙。這些生活的點滴，構成了疫情初期日常秩序驟然中斷後我們在北美社會的體驗。

臨近6月中旬，我們開始準備返回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由於新加坡已實施嚴格的邊境管控措施，我們的入境申請需獲得政府批准。在第二次提交申請後，新加坡教育部與人力部先後於6月15和16日批准了我們的入境許可。在大學的協助下，我們立即訂好機票，在6月19日一大早離開北卡，途經達拉斯，到達洛杉磯。

此時，偌大的洛杉磯機場早已空空蕩蕩，幾個身著全套白色防化服、手提拉桿箱的生化戰士模樣的人從大廳中列隊緩緩走過，恍如世界末日大片中的場景。最終，我們順利登上了新加坡航空公司的航班，印象中班機上機組人員多過乘客。經過近十七小時的長途飛行，我們終於返回新加坡，並開始為期兩周的酒店隔離。我們每天接受八次來自衛生部、大學和酒店有關體溫與健康狀況的例行詢問電話。隔離結束之後，我們回到校園，開始了在疫情下的新加坡的工作和生活。2021年底，我從南洋理工大學辭職，申請各種出境和入境文件。就這樣，我們全家又在疫情中離開了新加坡，回到了已經闊別八年半之久的澳洲，進入另一種疫情背景下的工作與生活階段。

回想最初開始這項研究的時候，我無論如何也預料不到自己在即將完成對上一個世紀的一場世界大流行病研究時，竟會同時親歷這一個世紀的世界瘟疫大流行，並有如此深度的跨國疫情體驗，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比較不同的防疫機制和社會生活。2011年，隨著關於赤腳醫生的研究接近尾聲，我開始認真思考第二本書的選題。英文學術界的歷史學研究以專著寫作為主，所以我始終認為，選題對成敗具有決定性的影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響，值得投入充分的時間與精力去考慮。關於霍亂，在我的童年時代，它有一個神秘而恐怖的代名詞「二號病」，令我記憶猶新。在浙江杭州地區做赤腳醫生研究期間，我就特意收集過一批杭州作為非疫區，在應對1961至1965年霍亂大流行時全民接種運動方面的資料。2012年，我根據這些材料寫成一篇論文，不久發表於 *Modern Asian Studies*。

但當時相比於霍亂，實際上我對邊疆地區的醫療、衛生和疾病史研究更感興趣，例如西南的川藏和西北的新疆地區。我認為，對這些地區的研究能夠揭示現代醫學、傳統中醫以及民族醫學與國家權力在現代民族國家建構進程中複雜而隱微的博弈，使我跳出一直以來在江浙一帶的生活和研究經驗，並加強對人類學理論和方法的學習和運用。同時，我對1966至1967年文革初期伴隨紅衛兵串聯而爆發的全國性腦脊髓膜炎大流行也很感興趣。這場20世紀中國病死率最高的瘟疫伴隨激進政治運動展開，令我既可以繼續對醫療、衛生和疾病史的研究，也可以滿足一直以來研究當代中國社會政治史的願望。

在2012至2013年，除了對霍亂的論文寫作和資料收集外，我對邊疆民族地區醫療史以及腦脊髓膜炎大流行也進行了思考和準備，我的幾位師長也給予了非常坦誠的意見。對於邊疆地區的研究，使我逐漸意識到，以我當時的功力（也包括現在的），無法建構一個新的理論分析框架，進而在目前的主流話語體系中，提出在中英文學界都具有說服力的論點。而對於文革初期的腦膜炎，資料極度匱乏以及難以確立問題意識成為我迄今都無法克服的難題。

逐漸地，我退回到1961至1965年中國東南沿海的霍亂大流行，以之作為第二本書的題目。此時，我已經在新加坡任教，結合大學的區域位置和學科優勢，我一度思考從中國和東南亞的疾病史和移民史的角度切入，嘗試些跨學科的突破。2014年6月，我從香港和廣州出發，沿著霍亂大流行的路線一路北上，經廈門、福州、溫州、紹興、杭州、上海，最後到南京，因為當年的霍亂基本蔓延到長江口為止。通過這一路對各地霍亂流行資料的摸底，我把題目進一步聚焦到東南沿海的霍亂流行與防控。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保留版權的資料

實際上，和其他世界主要流行病一樣，霍亂是一種古典的疾病，在中英文學術界早已有大量經典研究。尤其在英文史學界，運用社會科學方法開展的疾病史研究——亦即中文學術界通常所說的「外史」研究，自20世紀後半葉以來，大致呈現出兩種較為直觀的趨勢：一方面是研究時段和區域的轉移，從早期對19世紀中後期到20世紀初歐美地區的研究延伸至殖民地醫學研究，並從1970年代以來開始關注非洲與拉丁美洲；另一方面，隨著疾病模式從流行病轉換到慢性病，學術界對流行病史的整體關注有所下降，這種變化亦可在谷歌圖書的詞頻統計上得到一定程度的印證。

不可否認的是，自20世紀末以來，西方英文學術界關於疾病史、醫療史與公共衛生史的研究，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這種影響並非體現在具體結論的簡單移植，而更多體現在問題的提出方式與分析路徑上。例如，埃文斯（Richard Evans）基於文本史料的歷史學研究，凱博文（Arthur Kleinman）以參與式觀察為核心的人類學取向，以及福柯（Michel Foucault）圍繞權力、知識與身體展開的社會理論與哲學思考。我過去二十多年來對醫學、流行病與國家關係的研究也在不同層面上受惠於此。當然，這也對我們的中國經驗研究與學科對話提出了挑戰，或許可視為莫納什大學前輩楊小凱教授在21世紀初提出的「後發劣勢」的學術版。

不過，這並不影響我們繼續推進中國醫療、衛生和疾病史的研究。提到近現代以來的醫學，人們通常會援引19世紀細胞生理學家、社會醫學創始人之一——菲爾紹（Rudolf Virchow）的名言「醫學是社會科學，而政治不過是大規模的醫學」來說明醫學與政治之間的關係。而現代國家形成進程中醫學與政治之間的關係也正是中國近代以來醫療社會史的核心主題之一。

鑒於中國遼闊的疆域、龐大的人口規模以及高度延續的文明傳統，20世紀革命與現代國家建構所帶來的深刻變遷，使中國成為理解醫學、公共衛生與國家治理關係的一個獨特而重要的歷史場域。正是在這一宏大背景下，嘗試新的研究方法，包括借鑒社會科學方法，探討防疫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具有版權的資料

在內的醫療衛生機制如何在國家治理、政治動員、社會組織與知識生產的交互作用中被塑造，將在一定時期內繼續構成這一研究領域的核心議題。

本書把1961至1965年中國東南沿海的霍亂大流行，放置在一個宏大而廣闊的國內國際政治背景中考察。我將大躍進和文革理解為列寧型革命政黨在轉型為執政黨的過程中，身處同時與「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兩個超級大國緊張對峙的世界地緣政治格局，為追求現代民族國家轉型而進行的劇烈的社會政治實驗。獨特的內部結構和外部格局共同塑造了國家治理模式，並產生深遠的影響。在這種背景下探討疾病與政治的關係是有學術意義的。

在研究方法上，我從長時段和自下而上的角度出發，以期把這場世界大流行病放置在波瀾壯闊、跌宕起伏的20世紀中國社會政治脈絡中，從而擴大視野。而結合檔案、地方志和口述訪談等資料，並借鑒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相關理論，則可以突破單一學科的敘事和分析局限。這種實證研究具有強烈的學術意義和現實關懷。如〈導論〉中所說，選擇浙江省溫州地區的主要原因在於，現有的、可獲得的統計資料顯示溫州是這一時期整個東南沿海霍亂發病率最高的地區。這對於我來說是一種幸運的巧合，因為我在浙江有長期的生活和研究經驗。當然，最關鍵的是，我的研究旨在通過一個案例揭示一種機制，後者也可以通過對其他地區的實證研究進一步驗證與展示，例如當時疫情較為嚴重的廣東汕頭地區，甚至是遠在西北邊陲、有小規模疫情的新疆南部地區。

作為一項歷史學研究，地方文字資料，特別是檔案的收集是田野調查的核心工作之一。一段時期以來，檔案的開放性是困擾當代中國史研究的一大問題。我在研究的初期能夠相對順利地收集檔案，不久之後，我就只能摘抄。然而，與原先所想像的不同，我發現摘抄本身也是一種閱讀、篩選和理解的過程。實際上，我摘抄的內容最後在書中幾乎全都引用了。當然，在摘抄檔案成為新常態的形勢下如何開展研究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迫切問題。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具有版權的資料

能夠進行深入的口述訪談是當代中國史研究的獨特優勢。受訪者所分享的鮮活經歷和記憶為我打磨問題意識和分析框架帶來眾多的靈感。例如第3章「社會分化、流行病學與疾病分佈」以及第4章「檢疫與隔離：多重疆界的形成」。諸多的場景和它們帶來的興奮讓我終生難忘。同時，儘管這場六十多年前的瘟疫大流行基本沒有留下物理痕跡，但是我仍然嘗試實地走訪。例如，2017年冬，我來到位於溫州市西面的當年的梅嶴檢疫站，現如今已是一座香火不錯的寺廟。我站在山坡上，眺望遠處的村莊、公路和群山，這種時空位置給我帶來了歷史現場感和想像力。

在東南沿海地區數年的田野調查也極大地豐富了我對社會和生活的感悟。地方文史學者和受訪者的慷慨和敞亮，包括滴滴司機、快遞員和酒店員工在內的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積極樂觀的態度，都深深地感染了我。每次回國做田野調查都能滌蕩孤居異國和久坐書齋帶來的頹廢、偏執和狹隘，讓我充滿精氣神地回到辦公室寫作。當然，我也因此有機會品嚐各地美食風味。譬如，平陽炒粉乾是我有記憶以來吃過最好吃的炒粉乾。

田野調查方面比較遺憾的是對印尼和歸僑群體的研究做得不夠深入。我曾經到過雅加達印尼國家圖書館，試圖收集1961年前後的中文報紙書刊，熱情的館員甚至將我帶到東亞部的庫房，但一無所獲。我也曾計劃前往這次世界霍亂大流行最早的爆發地——位於蘇拉維西島的望江錫，但是臨行之前，由於當地爆發泥石流而被迫取消行程。我也幾次通過不同渠道聯繫位於新德里的世界衛生組織東南亞辦事處，計劃尋找有關印尼疫情的流行病學檔案，但始終未能得到回音。不過，在馬尼拉的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辦事處，我收集到了幾份重要檔案。至於當年的歸僑，很多已經散落各地，或離開內地定居香港，我一直未能採訪到這些人。

在建構分析框架方面，我試圖從社會科學理論中獲得啟發，但同時有意識地避免進行一種註釋式的歷史研究。我認真地閱讀了一些相關的人類學和社會學理論著述，包括福柯、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和巴什福德（Alison Bashford）的著作，他們的研究極大地開闊了我的視野，尤其是福柯似乎為研究疾病史和防疫政治量身定製了一個「理論工具箱」。因此，我在寫作初期立下「宏偉目標」——讓讀者不會讀出書中福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柯的痕跡。但是本書，特別是核心概念「緊急規訓國家」以及第6章談及的「統計政治」，都受到了福柯理論光芒的照耀。我想這是福柯思想博大精深的體現，我並不為此感到遺憾和失敗，因為我進行了扎實的中國實證研究，總結並呈現了中國經驗。從實證、經驗上升到理論，甚至是構建自主知識體系，需要建立在深入的個案研究基礎之上，這需要數代中國學人的不懈努力。而且，理論應該是普世性的，世界的是中國的，中國的也是世界的。

本書的英文版在2021年4月出版時，正值新冠肆虐全球之際，它對毛澤東時代防疫政治的探討引起了英文學術界和媒體的關注和興趣。因此，我很高興中文版能在5年後出版，進一步與中文世界的讀者交流。無論是相關專業領域的讀者，還是領域外的讀者，或許會很自然地將這兩場相隔六十多年之久的防疫運動聯繫起來。我在2023年底新冠疫情接近尾聲之際，曾舉辦一個工作坊，邀請十多位來自不同學科的學者們一起討論新冠疫情中的大數據與數字監控，獲益匪淺，極大地加深了我對數據、社會結構和國家治理的理解。這次工作坊也使我認識到，對當下問題的探討是社會科學同行們的專長，而我應該堅守和開拓當代中國史研究的陣地。

研究一場世界流行病的同時，親身經歷另一場世界流行病，並在不同社會制度下體驗防疫和日常生活，這種尷尬和無奈的巧合，除了加深我對疾病與政治關係的理性分析之外，給予我更多的，是對人類社會和歷史直接而具體的感性認識。社會結構和治理是傳染病流行和控制的核心主題，這一主題也貫穿人類歷史以及流行病的歷史。時至今日，我仍然不時想起我們全家在2020年6月離開美國時的場景：我六歲的小兒在空空盪盪的洛杉磯機場興奮地奔跑，甚至翩翩起舞；我在新航班機飛過太平洋上空時，特意觀看了電影《決戰中途島》，純粹想用作以後無聊時的飯後談資，相信疫情終將結束，生活終將美好。似乎，歷史總不以人的願望為轉移，歷史的劇本不斷重複上演。今天，我們已經生活在急劇動盪的世界中，即便如此，我仍然願意相信人類的智慧，因為生命、自由和尊嚴是我們共同的追求。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更新版補充資料

最後，我要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接受本書的出版，尤其是文本編輯倪朗軒女士耐心和細緻的校對，和製作團隊的專業排版設計。我同樣感謝萬芷均女士專業而流暢的翻譯，感謝上海海事大學李勇教授和浙江工業大學薛曉婧教授閱讀校對稿，並提出修改意見。我也感謝北京大學俞可平教授，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安舟（Joel Andreas）教授，上海交通大學劉士永教授，范登堡大學羅芙芸（Ruth Rogaski）教授和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賀蕭（Gail Hershatter）教授慷慨撥冗為中文版撰寫熱情洋溢的推薦語。我向所有接受採訪的受訪者以及關心和幫助我的朋友們再次表示誠摯的謝意。我也感謝妻子和孩子們一路來的陪伴。

方小平

於澳洲，墨爾本

2026年2月26日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致 謝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我對1949年之後當代中國史的研究興趣，最早源於1980年代初我在浙西小山村的童年經歷。在那個轉型的年代，山村生活仍然保留著毛澤東時代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的某些痕跡。同時，鄉村的人們開始見證、經歷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劇變。不久，村裏家家戶戶都買上了一台小小的黑白電視機，看電視很快成為鄉親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1986年，美國「挑戰者號」航天飛機失事，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畫面上美國人悼念遇難航空員的場景，激起了我對浙西大山之外廣闊世界的強烈好奇心。我開始喜歡看國際新聞，特別羨慕其中的外交官們。但我知道自己不夠聰明、英俊和瀟灑，以後不可能成為外交官。儘管如此，我在初中就開始喜歡文科，尤其癡迷於歷史老師口中生動的歷史故事。告訴同桌，以後我想研究歷史。我很幸運，在過去的數十年中，一直有機會追尋這個山村少年時代的夢想。在這漫長的旅程中，我有幸得到了許多善良人士的幫助。

對於本書，我要衷心感謝2011至2019年在中國進行田野調查期間為我提供慷慨幫助的朋友們，包括溫州的周保羅、王長明、王健和周步光，杭州的郎友興和劉杭、福州的丁立興、廈門的沈惠芬，以及廣州的朱崇科和陳麗園。過去一些年來，在中國進行田野調查變得日益困難，因此他們給予我的幫助尤顯珍貴。我也感謝所有願意接受採訪的村民、

衛生局幹部、醫生和退伍軍人，其中僅舉幾例，我要特別感謝魏善海、葉玉光、徐志競、韓永鋼、孫福芝、李成欽、黃水興、張文忠、高春釵、王景夫、尤榮開和何南高，感謝他們和我分享在毛澤東時代的生活和工作故事。他們的口述訪談為本書提供了扎實而鮮活的史料，啟發我確立研究問題和建構分析框架。訪談期間，我數次因為受訪者的隻言片語帶來的極大靈感而異常興奮，這些場景我將終生難忘。

我的檔案資料來源廣泛，包括浙江省檔案館、溫州市檔案館、瑞安市檔案館、平陽縣檔案館、永嘉縣檔案館、杭州市檔案館、淳安縣檔案館、杭州市富陽區檔案館和余杭區檔案館、紹興市柯橋區檔案館、廣東省陽江縣檔案館、馬尼拉的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地區辦事處、坎培拉的澳洲國家檔案館和紐約的洛克菲勒檔案中心。本書所參考的地方志主要來自浙江省圖書館和溫州市圖書館的地方文獻部。如果沒有這些檔案館和圖書館工作人員的傾力相助，我無法完成本書。我也要感謝我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研究助理楊婉欣（Sinta Yowendra）、陳偉傑和鄭釋恩，協助我完成了一些原始資料的整理工作。

我最初在悉尼科技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開始這項研究，隨後在南洋理工大學人文學院繼續進行，最終在北卡羅來納州的美國國家人文中心完成了書稿。在這些機構中，眾多同事曾給予我思想上的啟發、專業上的幫助與行政上的協助，包括馬利楚（Maurizio Marinelli）、Claire Moore、劉宏、李勵圖、黃美真、關詩姵、崔峰、孫曉麗、陳慧雅、彤麗思（Els Van Dongen）、Neil Murphy、Hallam Stevens、Brooke Andrade、Ian Burney、Lynn Miller、Tania Munz和Robert Newman。

感謝澳洲人文學院、悉尼科技大學、金氏東亞科技史基金會、新加坡教育部學術研究基金Tier 1（M4011572, RG146/15, NTU IRB-2016-12-004），以及洛克菲勒檔案中心的慷慨資助，使我得以完成田野調查，參加眾多國際會議。我還要感謝亨利．盧斯基金會，使我得以在2019至2020年前往美國國家人文研究中心駐院研究。

多年來，我在進行研究、撰寫本書的過程中，獲得了許多學者不同形式的幫助：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吳振強、澳洲新南威爾士大學的李木蘭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Louise Edwards)、香港大學的雷金慶、澳洲國會圖書館的韋傑夫(Geoffrey Wade)、美國本特利大學的吳章(Bridie Andrews)、喬治城大學的班凱樂(Carol Benedict)、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的Andrew Wear，以及愛丁堡大學的白馥蘭(Francesca Bray)，他們閱讀了我的出版申請計劃、整部書稿或主要章節，並向我提供了寶貴的修改建議。我的研究也得到了以下人士的幫助：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的周永明、阿爾瑪學院的卜麗萍、羅徹斯特大學的Theodore Brown、耶魯大學的Naomi Rogers、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的賀蕭、紐約市立大學城市學院的胡大年、范登堡大學的羅芙芸、史丹森大學的郭瑞琪(Rachel Core)、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的Raúl Necochea López、南京大學的朱寶琴、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徐秀麗、北京大學的俞可平、南開大學的余新忠、浙江工業大學的薛曉婧、復旦大學的董國強、上海交通大學的劉士永、中山大學的沈宇斌、香港大學的吳易叡、印度尼西亞大學的Aimee Dawis、印度尼西亞國家檔案館的Mona Lohanda、新加坡國立大學的Gregory Clancey和錢繼偉、澳洲國立大學的Carolyn Brewer、巴黎第七大學的Florence Bretelle、約克大學的Sanjoy Bhattacharya、牛津大學的Mark Harrison、倫敦大學學院的羅維前(Vivienne Lo)、萊頓大學的包樂史(Leonard Blussé)、柏林夏里特醫學院的司徒遇安(Lena Springer)、北卡教堂山的Sam Brooks，以及阿根廷的Victoria Patience。

此外，我非常感謝匹茲堡大學出版社衛生史與生態學叢書系列的編輯白錦文(Robert Peckham)和組稿編輯Abby Collier接受我的出版申請計劃，並協調評審和出版流程；感謝五位叢書編輯委員會委員對申請計劃和樣章提出建設性的意見；感謝兩位匿名審稿人投入大量時間審閱書稿，給我提出了許多寶貴而鼓舞人心的修改建議；感謝匹茲堡大學出版社編輯和製作團隊Amy Sherman和Alex Wolfe一絲不苟的工作。在出版社之外，我還要感謝文字編輯Maureen Creamer Bemko的校稿工作，以及丹佛大學司馬蕾(Hilary A. Smith)和劍橋大學白瑪麗(Mary Augusta Brazelton)為本書所做的慷慨推介。我也同樣感謝《溫州日報》、《人民畫報》和《僑務報》編輯部；感謝黃瑞庚惠允我使用他私人珍藏的圖片；感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謝張嘉玉為本書製作地圖；感謝SAGE出版公司允許使用我的論文〈全民接種與鄉村節奏〉（“Mass Inoculation and Rural Rhythms: Local Agents, Population Data, and Restructured Social Systems during the Cholera Pandemic in China, 1962–1965”）的部分內容，原文發表於《近代中國》（2020年7月）。

與許多同時代的村民們一樣，我的父母對毛澤東時代有著清晰的個人記憶與看法，但他們並不理解研究這段歷史的學術意義。儘管如此，他們知道我的工作很重要，並堅定不移地支持我。在我寫作最緊張的時候，母親來到新加坡照顧我的家庭和孩子，讓我得以專心研究。由衷感激我的妻子，近二十年來她任勞任怨，為我們的家庭犧牲了自己，使我一直能夠心無旁騖地投入研究。我們非常欣慰地看到兩個孩子逐漸長大，也看到這本書最終順利出版。因此，我將這第二部學術專著獻給我的妻子和孩子。

2020年春，當我完成書稿準備出版時，史無前例的新冠大流行開始肆虐全球。我親歷了檢疫隔離、社會恐慌和疫情訊息的政治化——這些都是我在本書中所論述的主題。作為一名研究流行病史的學者，我從未想到自己會對這些問題有如此直接的個人體驗，但我寧願不曾有過這樣的機會。我對生命和自由的理解，從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過。

方小平

於北卡羅來納，教堂山

2020年3月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